

辑佚

回忆

# “三座门”与丰利抗倭

□ 王继臻



明代丰利场镇周边水系示意图

丰利老街分东、西街和北街，大体呈丁字形，一般认为其发端于宋元，穿越明清而定格于民国早期，是千年古镇的缩影。

古代丰利是何模样？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题。从早期沙滩上星罗的亭灶，历经中唐的沿海村、南唐的“金岗亭”、北宋的催煎场，直到元初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游通州，盛赞通东海滨盐场甚多（当包括丰利等场），生产景象一片繁忙，并将所见所闻载入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……一言以蔽之，丰利自古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个“资于盐利久矣”的煎场。宋初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对它着墨并不多，只说隶属海陵监的南四场，其余却未详。再后来虽在宋《会要》中偶尔现身，乃断编残简，均鲜见市廛建置的记载。

今人对古镇形象的直观了解，最早可能是借助明代中叶问世的《两淮盐法志》，以及同时代的地方志。

一幅丰利场图显示，当时的镇区河道纵横，密如蛛网，月河、濫港、弯港、甜水港以及仇家河等众多河流从四面将古镇围住。宋代开凿的郑公滩与近旁水系融为一体，又将泰山（当时对土山的雅称）景区围在中间，南宋古刹东嶽庙、真武庙并立山前，溪水潺流，梵音缥缈，一座鱼骨桥沟通内外，堪称人间胜境。而山之西南又有佛殿池，一水从中引出，蜿蜒穿越镇区，有永丰桥架于其上，最后在西郊汇入盐运河。其余如安桥、东桥、欧家桥、永宁桥等分架各处，四通八达。盐课司、大使宅、赈济仓、社学以及其他寺观牌坊各有所在。纵览全镇，恰是做好了水的文章，倘若身临其境，大有可能将眼前的盐乡当成江南水乡！

古丰街在明代就有了丁字形的轮廓，《海曲拾遗》卷一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丰利有三门，东曰紫来，西曰迎淮，北曰里仁，关在西北运河口”。

此处的关乃指水关，为防禁私盐，盐课司在甜水港上专设，《弘治运司志》并记：水关前设有关桥。至于三门，却语焉不详。从称谓上看，前二者乃“紫气东来”“西迎淮水”的简义。而“里仁”则出自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原为择邻而居之意，总之无不体现古人附会风雅的做法。三门具体建造的时间难以考证，综合有关史料，可能与明代抗倭有一定的联系。

明太祖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倭寇

海上，诏命靖海侯吴祜督沿海卫所兵备之，又命信国公汤和筑海上备倭城，籍民四丁抽一为戍兵。到明代中后期，东南沿海倭患开始大肆泛滥。

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倭犯江北，盘踞在栟茶、丰利、掘港诸场，并以此为巢穴，四出剽掠，场人深受其害。暴东有事，知县吴宗元寝食难安，为长远计，始作六门用以防范，并力剿流寇，四厢暂趋平息。转眼又过去了一二十年，有汪直等奸民勾结诸岛倭寇卷土重来，从此真、假倭合流，贼势一发不可收拾，凤阳巡抚郑晓（1499—1566）奏发帑金筑如皋城以备战。

而丰利三门有可能是受如皋筑城门的影响而为。历史上古镇南郊一向为月河等所隔，加之其他原因，丰利历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南街，所以当时就对应了丁字街走向，筑了东、西、北三门，并因此而风雅一时。到后来随着暴东抗倭斗争的掀起，倒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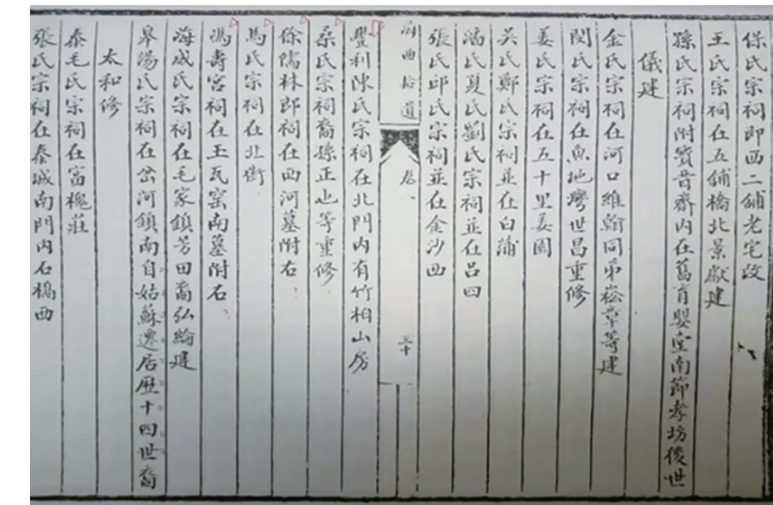
嘉靖三十三年春，倭寇3000余人自江南渡江，大举进犯江北。贼众聚啸而入，洗劫诸盐场，围困州县城，江海大地一时烽烟四起，满目疮痍，从此陷入长时间的动乱之中。时人陈尧在《通州被倭有感》中描述当时的惨景：“黄口鬻钱供国税，白头携杖点乡兵。”

春天未耒悬空壁，月夜旌旗照满营。

倭寇猖狂，暴东各场首当其冲，屡受摧残的民众不甘再受凌辱，乃纷纷起来反抗。丰利场时任副使杨虎，为人颇有胆识，且身怀武功，到任后即奉命组建灶勇乡兵，藉以保境安民。

当年三月二十二日，倭船一只载70余人，在长沙川水洼上岸。次日，又有百十人乘两船，从南坎登陆，贼以南北夹击之势洗劫掘港场，焚烧房屋数百间，杀死民、灶30余口。二十八日，贼自掘港场向西，分掠丰利、马塘，所到之处如无人之境，杀死灶民张朋葵等男女37口，焚毁民房近500家。嗣后，贼众经由从家坝向西一路焚掠，并屯聚于丁堰镇，窥视如皋城，当即全县上下震动，主簿严士奇急调乡兵布防，贼乃四处流窜，伺机肆虐。

九月十三日夜，有倭船一只从海上潜入丰利东北的鲨鱼洼，其中20余人登上西岸，随后携走灶户陈棚和吕四场的客人杨尊，以为人质。天亮后，杨虎闻报，即率灶灶勇前往追剿，贼船见状当即开



《海曲拾遗·祠堂》

洋避走。

九月十八日傍晚，倭贼乘岸上不备，又将船偷驶入弯港，妄图利用夜色掩护洗劫场镇。杨虎得讯后，连忙召集本场骁勇许昂、吴弘、陈章、桑桥、吴钦、耿相、丁钟等准备迎敌。杨虎之子杨进、保正钱才等也一同参战。见杨家父子一起上阵，士气更加振奋！

弯港南接郑公滩，北入海，东通盐港，因河道蜿蜒，故称弯港，其港口离镇区也不过七八里。众人行不多时，即远远望见倭众正在陆续登岸，杨虎乘其不备，大吼一声率众冲向敌群，奋力砍杀。暮色之中，但见刀光剑影，鲜血飞溅……倭寇约半个多时辰，灶勇们越战越勇，而贼势却渐不可支，纷纷败退，部分倭贼裹伤匆匆登岸，随后狼狽而逃。此时月光惨淡，腥风扑面而来，杨虎乃下令停止追击，并分派打扫战场。这一仗斩获倭贼首级8颗，杀伤者更众，缴获倭刀4把，弓箭若干。但灶勇许翱、桑本、王锦、管春等不幸阵亡。

弯港之战在古丰抗倭史上较有影响，打出了场人的英雄气概！鼓舞了当时的民心。有关史料将交战地点误记为凌河支港，可能与当年王飞虎抗倭，战死凉月河一战混淆了。

九月二十日，倭寇指挥王表、千户潘忠等率兵赶到唐家直东的埃沙横港剿贼，斩首4颗，余者四散而逃。二十二日，又有余贼5人窜至鲨鱼洼东岸，杨虎率陈梯等骁勇昼夜赶去，于次日辰时开始交战，斩贼一人，获倭弓一张，箭数支，其余慌忙遁入海中。二十九日辰时，杨虎又率陈梯等人马不停蹄赶往甜水港（丰利西北），在港东瞭见有贼，当即用箭射杀并斩首。

《丰利镇志》十九章有“吴弘抗倭”的记载，时间亦为嘉靖三十三年，情节略有不同，且称主人公为义勇官。其实吴弘乃丰利场的一名灶勇，孔武有力，出生入死，是杨虎手下的一员干将，屡立功绩，后升为弁目。在次年五月十一日的马（塘）西聚歼战中，他率丰利场的一班弟兄前往增援，在潮桥东边的无名河边，直杀得倭贼尸横遍野，血染河流。事后此河被称为“吴弘（泓）港”。

史载洪武十六年（1383），信国公汤和受命筑石港场土城，城外有濠，跨河为关，立四门。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巡盐御史崔椿为御倭奏发帑金，筑吕四城，一名鹤城，周近一里，高一丈五，设四门并二水关，明末清初坍入江。又嘉靖中余东场也筑有二城。其一名凤城，清康熙

中尚存规模，后渐圯，高不过丈，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潮缺五里墩坝，城尽毁，惟余砖甃四门，各有谁楼尚留旧观（见《南通盐业志》盐区名胜古迹）。

《海曲拾遗》把丰利三门也称为城门。既曰城门，似应有城墙与城楼，然而却没有任何史实根据可佐证。细加推敲，当年邻场为御倭而作门筑城并非通例，像丰利这样的地方，因民力所限，不排除主事者经权衡，放弃此类方案，转而扬长避短，利用近郊河流绕镇为“隍”，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既往战例也表明，当时交战地点总离不开境内的“港”“湾”，都与水有关。另一方面，从场图上看，那时沿海不仅遍布潮坝，还筑有烟墩，烟墩乃为瞭望报警所设，一旦来了倭船，即点火生烟。丰利虽无城，然而所筑之门想必也不含糊，乃采用传统的版筑法，就地取材，以土夯筑，外表再整以砖石，上建敌楼，以供瞭望值守。这样每遇寇情，便鸣锣示警，并及时闭关，以防对方长驱直入。

暴东抗倭，古丰作门，五百年世事沧桑，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，可《海曲拾遗》卷一里还有这样一条信息：

“丰利陈氏宗祠在北门内，有竹柏山房。”

陈氏乃古丰世家，当年汪之珩辑《东皋诗存》，作为同里好友，陈绿韵、陈清浦兄弟双双进入卷首的“参阅姓氏”名录。竹柏山房为二陈的私家花园，曾吸引不少文园诗友造访，汪之珩就有《竹柏山房夜话》：乘醉寻幽兴未阑，风光不比昨宵寒。霜如柏竹清如水，月照庭轩大似盘。若茗倾洗尘埃净，新诗细论蜡烛残。逸情本自能忘寐，何况君家有二难。

这里的“二难”，特指陈绿韵、陈清浦兄弟俩才学俱佳，高低难分。有关汪之珩与陈氏兄弟诗酒唱酬的往事，徐继康先生在《文园古丰》一书中有专门的介绍。这里权且让我们先关注一下“北门”。按《海曲拾遗》的说法，直到清乾隆年间，也就是丰利三门问世200多年后，北门还在。这与前述有关邻场相关古迹的境遇大体相符。陈氏宗祠大约建于清初，据《丰利镇志》，陈氏宗祠位于北街虹桥南，临街朝西，有房屋十多间，日伪时损毁。由此反证，北门在虹桥以北，今天的北街就是丰利的古街。但虹桥以北的北街还有近半里长，北门的准确位置到底在哪里呢？还有东、西二门也同样存疑。正所谓“朱雀门外”“乌衣巷内”，沧桑变化，世事如棋，古代丰利三门的庐山真面目，有待慢慢揭示！

# 搭伙记

□ 管霖

我从2011年3月退休后，除写些小文章外，闲暇时，喜欢独自到兵房镇上去蹉跎，散散步。

尤其走到原兵房中心供销社地段时，心情格外沉重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，把目光投向巍然屹立在镇中心东侧的供销大厦，有时还会绕到大厦后边去转一圈，因为我曾经在供销社食堂搭伙9年之久，对这里是烂若披掌太有感情了！

故事还得从1974年说起，那时我在南坎公社（今大豫镇）培新小学任教。

记得是在9月下旬的一天清早，老师们正在洗漱，学校门前进来一位陌生人，打听哪位是明德彬校长？早饭后，管校长对我说：“掘东区教育组来函借调你，你暂把手头工作移交给我，明天上午去报到。”

岂知，报到后一周便调到了掘东区文化站。

有道是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。可到了文化站后，工作生活环境都起了变化，首要的吃饭成了问题，别说食堂，就连最常用的炊、餐具都没有。起初，到同学那里吃了几天，可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，每人每月只供应29斤口粮，趟数去多了自己也觉得难为情。

调任掘东区委秘书的前任站长吴庭家告诉我，他家住得近，一般情况下都回家吃饭，偶尔到其他单位搭个伙。

我为人特爱面子，又怕找人麻烦，加之刚从基层上来，人地生疏，到哪儿去搭伙呢？纠结了几天，才壮着胆子找到一家靠近的邮电局食堂，局长说，他们人员流动性大，吃饭不定，把我给拒绝了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地有好生之德。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一天上午，兵房中心供销社的文艺爱好者王明庚到站上来谈演出事宜，听说我吃饭的地方至今还没有着落？

他便热情主动地对我说：“我替你联系到供销社食堂去搭伙，我们供销社几十个人吃饭，不在乎多个人。”

事不宜迟，说办就办！

于是，王明庚立即把我带到供销社会计室的张颂尧会计身边，张会计听说我是文化站新来的，很高兴，因为他家就在文化站南隔壁。但高兴之余，他向我透露了一句心里话，“我答应你在食堂搭伙，不知道食堂的杨师傅是否同意？”

说话听声，锣鼓听音。王明庚为人聪明灵活，随即又把我带到了食堂，供销社的食堂在办公室的南对面，当中隔一个大场心，食堂大门朝北，东西4大间，里边摆着用自行车箱子板做成的10几张长条桌，桌子两边宽条凳也是用自行车箱子板做的，每张桌子可供10~12人同时用餐。伙房在最西头的1间，并装有半榻子玻璃排窗，排窗西侧面摆有对等长2张条桌，1张专供打饭，1张卖菜。1副3眼大灶置于伙房北侧，3格水泥蓄水池贴在西墙壁上。

当我俩步入食堂的那一刻，一眼就看见一个50多岁的老师傅，光着头，胸前戴着一个回纺布大饭单，正站在大灶前的踏板上手持大铲刀在用力炒菜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杨师傅，食堂负责人。

我俩一前一后走到杨师傅身旁，王明庚首先很有礼貌地叫了一声“杨师傅，今天中午的菜不错啊！”杨师傅一听有人夸他，便关掉鼓风机，放下手中的铲刀，转过身来

一看，“噢，是明庚儿啊，没有什么好吃的。”

王明庚见杨师傅今天的心情特别好，便见缝插针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杨师傅，我找你帮个忙？”

杨师傅回答：“明庚儿自己人，别客气，只要用得着我，谈不上帮忙。”

王明庚接着说：“文化站来了个新同志，听说你的烧菜手艺好，想在你这里搭个伙行吗？”

“不嫌我烧的菜不好吃，多个把人没问题”杨师傅用谦虚的口气笑着说。

此时，我看到杨师傅满口答应，赶紧递上香烟，他点着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后，问我“小伙子哪块（里）人？”

我回答：“杨师傅找你麻烦了，我是南坎人。”

他一听我说的本场话，频频点头，笑声朗朗，连声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

杨师傅叫杨瑞斌，1926年出生在环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没有文化，少年时讨过饭，打过短工。由于性格豪爽，人缘好，做事勤快，17岁时，进“三官殿”当了香伙，后学得一手烧菜技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“破四旧”运动中，杨师傅回到了生产队，因他烧菜的名声在外，方圆10多里内的红白喜事席席都请他去操办。

常言道：“有能者人爱之”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杨师傅经人举荐当上了兵房中心供销社食堂的大师傅，他的到来，把一个原本领导闹心的食堂，搞得风声水起，深得广大员工的一致好评。

我虽不是供销人，但胜似供销人。

在与杨师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深感此人只要合他的脾气，不违背食堂规矩，什么事都好说，同时他还特别关心人。

我从小学六年级起，因饮食不周，患上了胃病，走上了教育岗位，胃病还是一直折磨着我，当杨师傅得知我有胃病后，便主动关心我，我去食堂迟了，他就把饭菜重新热好了给我吃，菜里有辣的东西，他会叫我吃别的菜。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，他知道我喜欢吃醉螃蟹，一天中午，我去食堂晚了，眼看醉螃蟹快要卖完，他便将剩下的2小盆醉螃蟹倒进了酱油坛子，等我去吃饭时，他连忙从坛子里把醉螃蟹捞出来端给了我，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觉得一股爱的暖流在心中涌动。

1982年秋季开学，我把儿子从农村小学转到兵房小学读书，父子俩在食堂就餐，他从不嫌麻烦，我有时外出工作饭时赶不回，他会主动替我照顾孩子，我真是从内心非常感激这位长辈之人。

由于父子俩在食堂就餐，花费较大，我当时月工资34.5元，除去吃饭，剩下的也就无几了。

1983年起，我依依不舍地结束了食堂搭伙，自己购置炊、餐具，搞起了自炊，当我去向杨师傅道谢告别时，才知道他已办好了退休手续……

岁月悠悠，白云苍狗。屈指一算，我已在兵房工作生活49个年头了，如今回想起在供销社食堂搭伙的情景，仍历历在目，杨师傅虽早已过世，但他的面容笑貌依旧镌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## 科学防疫再提醒

# 不握手 常挥手

## 问候礼仪树新风

